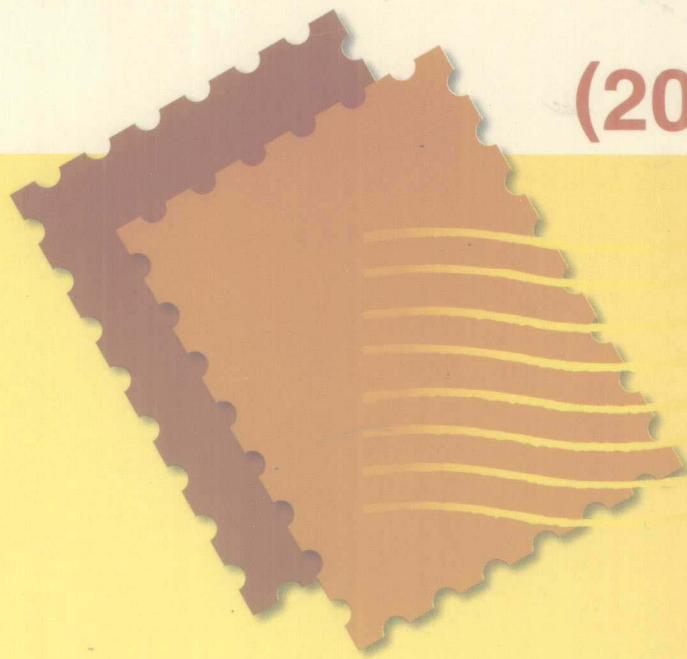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综合工作部 编

中国集邮研究文选

(2004~2007)



中国集邮研究文选

(2004~2007)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综合工作部 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集邮研究文选: 2004~2007 /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综合工作部编.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115-19894-5

I. 中… II. 中… III. 集邮—研究—中国—2004~2007—文集 IV. G89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0836号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2004年至2007年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组织的10次学术活动中的优秀论文, 是中国近年来最高集邮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汇, 对中国的邮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适合集邮协会工作人员、集邮研究者和集邮爱好者阅读。

中国集邮研究文选(2004~2007)

-
- ◆ 编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综合工作部
责任编辑 郝宪明
 -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字数: 394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印数: 1-1500册 200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115-19894-5/TN

定价: 38.00元

读者服务热线: (010)67134361 印装质量热线: (010)67129223

反盗版热线: (010)67171154

目 录

一、“2004香港邮票博览会集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中国的旅大天安门50元邮票版式研究 / 刘广实	1
汉口五国租界“客邮”始末 / 陈 波	5
集邮与旅游相得益彰 / 林 轩 黄玉魁	10
旅游因集邮而精彩 / 宋晓文	13
走出邮政史研究的误区 / 许庆发	15

二、“2005中国集邮论坛”论文选

刍议把集邮文化融入先进文化建设大潮 / 田圣德	17
清代国家邮政时期大圆日戳的研究 / 赵人龙	21
试论实现集邮强国 / 王光力	27
原地分类及确定原地的基本原则 / 童国忠	31
正视挑战 积极应对 ——关于新世纪发展我国集邮事业的思考 / 陈远才	36

三、“2005全国文献集邮论坛”论文选

集邮文献的定义与分类的探讨 / 柳承美	39
探索我国集邮期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 邵 林	42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集邮图书创作的新特点 / 李毅民	45
完善邮文索引 服务集邮研究 / 刘大有	49
从自然到自觉 由集藏到实用 ——论文献集邮的意义、演进与发展趋势 / 胡建康	53
评刊·读刊·作文 / 陈 京	56

四、“2005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集邮学术研讨会”论文选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内中华邮政实寄封研究 / 李曙光	59
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邮政与交通 / 李汇祥	77
《新路东》报与“稿”字邮票 / 许锡良	83
山东大众日报社“战邮总局”邮资封考证 / 王景文	87
抗战初期经中华邮政寄递的新四军邮件研究 / 张 雄 唐中杰	91
从朝鲜的抗日战争题材邮票看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 / 朱祖威	96

五、“2006全国体育集邮论坛”论文选

略论体育集邮的文化价值 / 田圣德	100
试从体育邮票的发行看新中国56年来的体育热 / 苏肖晴 陈 争	104
奥林匹克运动与奥林匹克邮票：历史、现在和未来 / 和 平	108
中国体育邮票如何应对奥运战略 / 张运达	112
奥林匹克精神永存 ——奥林匹克邮票设计及其它 / 王泰来	116
关于新时期体育邮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 陈远才	123

六、“2006新长征集邮热点问题研讨会”论文选

集邮业务的变化与思考 / 宋小林	127
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 ——谈长征胜利与三军会师的几个问题 / 李宁勇	132
论集邮宣传工作如何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 何国平	135
专题集邮的生命所在：创新 ——试论提高专题集邮在国际上竞争的能力 / 李伯琴	137
从长三角集邮圈的构建看我国区域集邮活动的发展 / 葛建亚	140
集邮与构建和谐社会 / 王新中	143
最佳邮票评选改革之我见 / 刘 劲	147
如何看待集邮的冷与热 / 黄存田	15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邮票的进步与不足 / 李毅民	153
多元化——国际集邮展览的发展趋势 / 王宏伟	157
青少年集邮与素质教育 / 侯仲琪	160
转变理念，创新方式，追求快乐 ——对“新世纪我们怎样集邮”的思考 / 宋晓文	163

七、“2006全国文献集邮高层论坛”论文选

博学增知 明辨笃正 / 林衡夫	165
对集邮图书分类的思考 / 孙少颖	167
集邮文献收藏的文化价值 / 李毅民	171
试析我国集邮报刊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邵 林	174
文献集邮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 / 葛建亚	177
文献集邮展品规则的制定及评审 / 林 轩	181

八、“2007集邮学术高层论坛”论文选

发挥集邮品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 戈中博	184
高举先进文化旗帜,巩固发展集邮组织 / 佟正光	188
关于我国集邮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 / 葛建亚	191
化解集邮“后继无人”局面的对策 / 林衡夫	198

九、“2007全国集邮学术论坛”论文选

创建和谐集邮,促进集邮文化持续发展 / 郭润康	201
创新工作机制 构建和谐环境 不断增强集邮的社会创造活力 / 梦云	204
略论建设和谐文化社会与集邮文化持续发展 / 田圣德	212
香港第一、第二轮生肖邮票研究 / 李升平	216
谈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印刷的中华邮政邮票 / 狄超英	221

十、“2007全国高等院校集邮教学研讨”论文选

演绎“方寸天地”的精彩世界

——搞好《实用集邮学》选修课教学的几点做法 / 李曙光	229
-----------------------------------	-----

高校集邮选修课教学问题探讨 / 程兵	234
浅谈高校集邮教学的意义、步骤与方法 / 戈中博	237
试论集邮学课师资队伍的建设 / 赖景耀	240
高校集邮课教学要与时俱进 / 朱大钧	244

中国的旅大天安门50元邮票版式研究

● 刘广实

1950年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天安门图案“旅大贴用”普通邮票，在中国出版的权威邮票目录中，志号为“普旅1”，但因并无后续的2、3等号，故也称为“普旅”。这套邮票有五种面值，其实用的地域较小（仅一个小邮区，也可说是一个城市），铭记的级别却很高（国家邮政）。它的流通时间短（1950年3月10日至6月30日），发行数量相对较少。在中国邮票史上，兼有这些特点的，似属独一无二。自2002年秋，笔者与广东省的吕、余、罗、黎等邮友一同论证了“普旅”是凸版印刷（而不是平版胶印。参见《南粤集邮》2003年第1期），更对其版式多了几分关注。现以所见面值50元的全张及多件大、小连票，试作一篇关于版式的综合研究。

“普旅”的单枚图样面积为 $17.75\text{mm} \times 20.5\text{mm}$ ，油墨较为浓重时也可量得为 $18\text{mm} \times 20.75\text{mm}$ ；全张 $10 \times 10 = 100$ 枚。已见50元全张票图的总面积为：上下横长 222.5mm ，左直长 247.5mm ，右直长 248mm 。齿孔是不很规则的 10.5 度线式齿，纸张为比较厚的无底纹白纸。全张版式已基本认清，现先发表图示，下面再分节进行说明与讨论。

1	Aa	A	A	A	A	Aa	A	A	A	A	2
	B	B	B	B	B	B	B	B	B	B	
	C	C	C	Cb	Cc	C	C	C	Cb	Cc	
3	A	A	A	Ad	A	A	A	A	Ad	A	4
	B	B	B	Be	B	B	B	B	Be	B	
	C	Cf	C	C	C	C	Cf	C	C	C	
5	A	B	C	Ag	B	A	B	C	Ag	B	6
7	A	A	A	Ah	A	A	A	A	Ah	A	8
	B	B	B	B	B	B	B	B	B	B	
	C	C	Cj	Ck	C	C	C	Cj	Ck	C	

（一）三种版型的特征

图示中的大写A、B、C代表邮票分型的型号。A型的特征有：

（1）天安门城楼正面顶部右起第七条斜线的中间偏下处断裂；

（2）面值中“圆”字右方的（自上向下）第3条细横线在距“圆”字约 1mm 处断裂；

（3）华表的云板右方的（自上向下）第4条细横线的左部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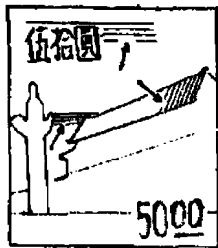


图1 A型特征

以上特征见图1。

B型和C型都不见有如A型的三个特征，也就是说见于A型的三处断线，在B型和C型都没有断裂。B型和C型的差别可从“大”字顶部两侧的粗线来区分。在B型，此两线与“大”字顶部颇为接近，两线端点的距离为 0.5mm （图2。附带提一下，凡A型票于此处也同样是“近距离”者）。在C型，此二线都与“大”字顶部距离较远，两个端点的距离约达 1mm （图3）。通过分型可知：50元票在制版时实由一个原模先制成三个母模，然后再按一定的步骤翻制、拼合，组成一个100枚的印制全版。



图2 B型特征



图3 C型特征

（二）左、右半张中的同样的子模特征

图示中的小写a、b、c……k是指把全张分为左、右两部分（二个半张）进行观察时，在左、右（各为 $5 \times 10 = 50$ 枚）的相同部位邮票上都能见到的同样的子模特征。这类“左右同特征”的子模见有10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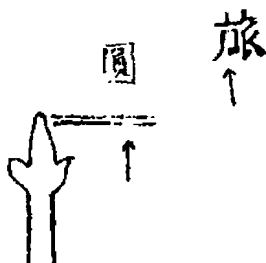


图4 a号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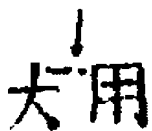


图5 b号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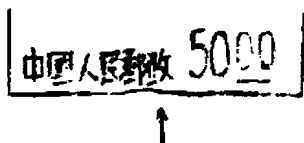


图6 c号特征



图7 d号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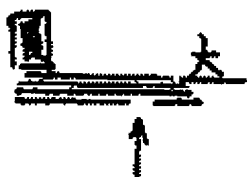


图8 e号特征



图9 f号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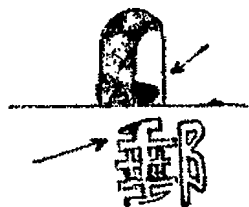


图10 g号特征



图11 h号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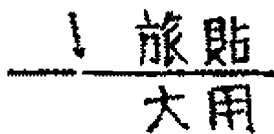


图12 i号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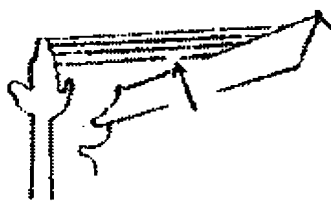


图13 j号特征

a. (1) “旅”字左边旁的右下部较短，即“方”的下勾的尖形底部短缺而呈横平状。(2) 华表顶部右方自上而下第2条细线上有一裂口，位于“圆”字下方。以上特征见图4。

对照前面的图示可知：具此特征的子模分别属于左半张的第1枚（也是全张第1枚）和右半张第1枚（即全张的第6枚）。以下各号之与半张或全张票位的对应关系从略。

b. “大”和“用”顶部之间的粗横线的右部断裂而呈一游离的小点状（图5）。但当油墨浓重时此裂痕不够明显。

c. 票图的底边不是平直线，而是呈向上拱起的曲线状，“政”字的下方拱起最高，如图6。

d. 票图左顶角有一（从右上至左下的）斜破口（如图7）。有时也见破痕穿过顶角，呈一游离图外之小三角形。

e. “大”字（或“圆”字）下方第4条细横线断裂，裂口位于此二字直下方的中间偏右处（或距左图框10mm）（图8）。

f. “旅”字左方第3、4条粗横线的右端之间有色

点，如图9。但油墨较淡时，此点不够明显。

g. (1) 阴文“邮”字第一笔左部内中有一色块，常见几乎可将左部完全遮没。(2) “邮”字上方的（从左数第2个）城门口的下部也多出一大色块。以上特征见图10。

h. 华表云板右方的第4条细横线，在A型共有的裂口之右又多出一个裂口（图11）。

i. “旅贴”和“大用”之间的粗横线的左部断裂，裂口位于距“旅”或“大”字约1mm处（图12）。

j. 华表顶部之右自上而下第4条细横线的右部断裂，裂口位于“大”字左下方，距城楼屋脊约0.75mm处（图13）。

以上10对特征中以a和g为最突出，具备列入目录或图鉴的条件；另外8对的特征虽较细小，却也清晰易辨。据此可以初步认为：左右两半不仅是版型分布相同，而且有更为密切的整体同源关系。

（三）半全张内的票图位置关系

图示中绘出的八个方块及其左（右）的数字，

是指全张中的各个“格”（或印版中的各个子模组）及其序号。对很多的邮票来说，研究至此已可告一段落。但在“普旅”50元，却因各格之内的子模排列以及格与格之间的位置排列都欠整齐，致使相邻邮票票图之间也有一些互不相同的情况，而這些“不同情况”在左、右半张中的部位也都一样。以下分别就主要的“不同”作些记录。

1. “15枚子模组”。在半版中有三个（或全版中有六个）基本上同样的“15枚子模组”，组内子模的排列是：

1.1 第1横行的5个子模的排列比较平齐。

1.2 第2、3横行的各个子模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左下至右上）倾斜。只看一枚时，倾斜或欠明显，取之与左右对比就较清楚。特别是取最左面的第1枚，将其底外框线向右延长至第5枚，各枚的倾斜以及逐枚偏高现象更觉明显。相邻两枚的高低差距或只在0.25mm之内，而第1枚与第5枚的差距（第1低于第5）则达1mm左右。换一个角度说，在这二行中都有可能找到一对“左低右高”的横双连票。

1.3 横行之间的上下距离大致是4.5mm左右，直行之间的左右距离则以第4、5行的距离较阔（接近5mm），其余的左右横距也在4.5mm左右。

1.4 整个子模组内图样的总面积约为108mm×70.5mm。

2. “5枚子模组”。此组在半张中只出现一次，5个子模的排列基本平齐。但各子模间（也就是各直行间）的间距都比“15枚子模组”的阔约0.25mm~0.5mm不等。因此，票图的横向总长可达109mm。

3. 两类都欠整齐的子模组经过拼合，又有新的不够协调的现象。具体可见的“不同”有：

3.1 格与格之间的票图的直向（上下）距离不同。如第3、4横行（即第1、3格或第2、4格）的间距，在左右端均约5.5mm，而第6、7横行（即第3、5格或第4、6格）的间距却为左端长（略长于4mm），右端短（3.5mm），第7、8行（即第5、7格或6、8格）间又为左端短（略长于4.5mm），右端长（5mm）。

3.2 格与格之间的票图的横向（左右）位置也没有

很好对齐，较突出的有第3格第1枚偏左，第1格第3横行第1枚较其下方一枚偏右等等。像这样的格与格之间距离有别的事实又表明：如果仅有一件直双连票，也有可能推究到它是出自全张中的哪二个横行。

（四）印刷全版的形成与之相关的特征

根据对实物的观察与测量的结果，可推论印刷全版的产生应有以下几个步骤：

1. 把原模复制成A、B、C三个母模。

2. 把上述三个母模竖直地连成一体，成为直三连形式。

3. 把上述的“直三连母模”复制五次，成为5×3=15枚的子模组。

4. 把“15枚子模组”进行复制，至少应得到四个同样的和可供使用的子模组。

5. 上述四个子模组中有三个已够用于半版内的45枚之数，另外再从第四个子模组中取出五个子模，将之重新横排为“ABCAB”的五枚一小组，用以凑足半版所需的总数50枚。

6. 把三个“15枚组”和一个“5枚组”按“15—15—5—15”的形式拼成半个印版。

7. 把半个印版再经复制、腐蚀等工序，最后制作成整个可以印刷的凸版。印刷全版即由两个半版所合成，而在合成过程中或又因技术要求欠高，致使在两个半版之间，也就是全张的左、右两半之间又出现了新的“错位”。具体地说，就是在全张第5和第6直行之间又有了（而且是更为明显的）票图互有高低的现象。看似特殊的是在第1至第6横行的第5、6枚是左高右低，但从第7横行起，却又是左低右高。这样的左右高低不一的根源，除第1横行在拼版时就已见左比右略高之外，其余的偏高，仍在于前几道工序中的“不够整齐”。如“15枚子模组”中的横行第1枚常低于第5枚，所以在左、右拼合后，全张的第5枚（也是左半张的第5枚）自然就会比其右的全张第6枚（也是右半张的第1枚）高出约1mm。这就是第1至第6横行中间部分“左高右低”的产生原因，而以其中的第2至第5行最明显。

从第7横行以下的“左低右高”，原因更在于该行所出自的“5枚子模组”。该组与其上、下子模组

的间距都是左（第1枚）短，右（第5枚）长，制作到全版之中，就成为第6、7、8横行中间部分的上、下图距都是左长右短。左边距离“长”，左边邮票票图的位置也就随之“低”下去了。

（五）全张中的其它版模特征

以上所讲的各种可以表现在单枚或双连票中的版模特征，都是因制版的技术关系而产生的必然现象。除此之外，在全张中还可可见有另一大类有助于子模定位的特征，那就是曾用以论证其为凸版印刷的重要依据——把整个锌板（或铜板）装到木质垫板上使用的圆钉所造成的特征——圆钉头的痕迹和被圆钉碰损的子模。

圆钉头痕迹可见于（序号前加*号的比较明显）：

1. 全张第1、2、11、12枚之间。
2. 第3、4枚之间。
- *3. 第5枚右方。
4. 第6、7枚之间。
5. 第11、12、21、22枚之间。
- *6. 第40枚上方。
7. 第41与51枚之间。
8. 第60枚上方。
- *9. 第70枚下方。
- *10. 第75、85枚之间。
11. 第80枚右方。
- *12. 第90枚下方。
13. 第91枚左方。
14. 第95枚上方。

因为圆钉碰击而使边框遭到破损的子模有：

1. 全张第14枚的右边框（在“用”字之右，但缺口较小）。
2. 第16枚的上边框（在“拾”字之上）。

3. 第74枚的左边框（在左边的下1/3部分有2处小缺口）。

4. 第84枚的左边框（在华表的中段位置之左有几处小缺口。又按：第74、84两枚的破口也可能出自其他的磨擦而非圆钉的打击）。

5. 第92枚的左边框（在华表的云板之左）。

6. 第95枚的上边框（在“旅”字之上）。

除上述的“制版引起的”特征之外，在全张中还能见到一些（甚至较多的）图中断线、图中多色点或边框外多出色点、色条等等，但不能认定或已能否定为固定的特征，故均从略。下面只提一枚比较特殊的“版模划损”邮票（图14）。

此枚邮票位于全张第89号票位，在其主图中有一条虽细但却很长的破裂斜线，从“旅”字的左下方直至左外框距底4mm的内侧，穿过城楼的飞檐和华表的下半段，总长约为15mm。这条斜线不知是制成全版时就有，还是在印刷过程中出现。如是前者，自是一个很好的固定特征；如属后者，则可作为反映印刷过程中的变异。

总计在50元的全版之中，能够基本辨明位置的子模占大部分，所以若遇一件9枚左右的连票，通常多能找到它在全张中的位置。这对探讨“有几块印版”之问题很有用。例如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虽只用了一个全张，但可以空位置的连票却有多件，而这些连票内的种种特征，都与全张中的同部位者完全一样。据此，作者认为：“普旅”50元票可能只用过一块印版。同时，也希望由于本文之发表，能见到更多的连票、全张资料，从而有益于“一个面值只有一块印版”问题的继续探讨。



图14

汉口五国租界“客邮”始末

陈 波

在清末民初的外国在华租界中，位于长江中游的汉口的五国租界，仅次于天津的八国租界而位居第二，由此可见列强各国对被习惯称为中国内地“九省通衢”的汉口所处地位的极大重视。而在外国在华“客邮”中，汉口五国租界内外先后开设的“客邮”局所的数量，也仅次于沿海一带最早开埠通商的上海和天津两地，从而成为中国内地“客邮”局所最为集中的一处通商口岸，在近代中国的“客邮”兴衰史中曾经占有重要的位置。

一、各国在汉“客邮”的缘起

依据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汉口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对外开埠通商并设立英租界，英国首先在汉口设领事馆。当时中国尚未建立近代邮政，官方的公文书信均由设立已久的驿站传递，而民间寄递书信物品，则大多依赖于各家民营信局。

1866年（清同治五年），刚刚设立不久的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掌管海关大权的英籍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Sir Robert Hart）的一再要求，终于批准将原来由驿站代寄的各国驻华使领馆公私邮件，转交由外籍“洋员”们所把持的海关办理传递。包括汉口江汉关在内的沿海沿江各主要商埠的海关，随即为此专门设立了邮务处（Postal Department）兼办邮政。但由于海关所设的邮务处以及后来在此基础上开办的海关“拨驷达局”（Post Office，即海关邮局的音译，亦称“海关书信馆”），均为大清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前由海关试办的邮政机构，当时未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因而无法与各国邮政部门直接交换邮件。各国驻华使领馆及其来华商民与本国或其他各国的往来书信，仍然必须自行委托各国来华商船或军舰运送。于是，为

了与本国及其他各国通讯事务的方便，列强各国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擅自设立官办邮局，并被中国方面称之为“客邮”邮局。

其时作为华中腹地最大通商口岸的汉口，华洋共处，商贾云集，交通发达，盛极一时。在英、法、德、俄、日五国先后于汉口设立的租界内外，曾分别有上述各国官方开办的多处“客邮”邮局、代办所等机构，发售各种专用邮票及邮资信封、邮资明信片、邮筒等邮政用品，并收寄、投送华洋各界的各种邮件，直到1922年底才全部关闭停业。

二、汉口的英国“客邮”

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于1872年（一说为1875年）首先设立了1处邮政代办所，后改为正式邮局，地址位于汉口英租界河街的英国领事馆内（今天津路2号市政协院内）。该局由英国在香港的邮政总局领导，使用英国为香港专门印制的殖民地色彩的邮票，主图均为当时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或继位的爱德华七世国王的头像，其面值以中、英两种文字表示的港币“仙”（Cent）或“元”（Dollar）为货币单位。1917年后，该局又开始使用在香港邮票上加印英文“CHINA”（中国）字样的香港邮局在华专用邮票，主图为英国乔治五世国王头像。该局曾先后使用过刻有英文“HANKOW · BRITISH POST OFFICE”（汉口·英国邮局）等字样的数种邮政日戳盖销邮件，直至1922年底关闭停业。

这家在汉口的英国邮局建立后，当时不仅英国驻汉的领事官员，而且在汉的各国商民也都曾利用该局寄送发往中国各通商口岸（如上海、香港、天津、广州、宁波等地）和欧美各国的邮件，直到大清国家邮政于1897年春正式建立后才逐渐改交中国邮局办理。而汉口江汉关聘用的英籍官员等人，

在此之后仍然对当时已经初具规模的中国国家邮政系统不屑一顾，继续使用这家英国邮局交寄海外邮件，以期能够更快地送达目的地。

汉口英国邮局除办理收寄平信、挂号信、普通包裹、保价包裹、保价信等业务外，还办理邮政汇兑业务。所有函件均由来往于沪汉间的英籍商船运到上海，再由设在上海和香港的英国邮局中转中国国内以及国外其他各地。该局起初只收寄在汉各国侨民的邮件，后来才兼为中国人办理业务。其邮资费分为两种：寄往英国国内、英属各殖民地以及英国在华设有邮局各地，按英国国内邮资收取；寄往已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各国的，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资费收取。因此从汉口租界寄往英属各地的邮件，由于可按英国国内邮资交寄，寄信人大多愿意选择这家英国邮局办理。根据汉口江汉关英籍税务司编写的《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2·江汉关》中的调查统计资料，该局每月收入平均可达1500美元。

三、汉口的法国“客邮”

法国于1896年在汉口设立租界后，其驻汉领事馆于1898年11月（一说为1899年，待考）开办了一等邮局1处，设于法租界玛领事街（今车站路中段）附近。该局由设在法国巴黎的邮政总局直接领导，起初使用加印了法文“Chine”（中国）字样的法国各种普通邮票，1902年以后开始使用以法文大写“POSTE FRANCAISE CHINE”（法兰西邮政·中国）为铭记的在华专用邮票，其图案与法国在各海外殖民地发行使用的邮票图案相同，面值以法国法郎为货币单位。不久后法国邮局又在这种专用邮票上以中、英两种文字加盖了在中国流通的银元（洋银）面值后出售，并使用刻有法文“HAN-KEOU CHINE POSTE FRANCAISE”（中国汉口·法兰西邮局）等字样的小型邮政日戳盖销邮票。

汉口法国邮局所收寄的邮件，如寄往法国国内或法属殖民地以及法国在华设有邮局各地（如上海、天津、广州、厦门、宁波、蒙自等处），按法国国内资费收取；如寄往已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各国，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邮资标准收取。该局所收寄的邮件大多经由设在上海的法国邮局中转，

再由法籍商船运往法国或世界其他各地。此外，法属安南（亦即所谓“法属印度支那”）邮局设在我国内地重庆的分局，其发往长江中下游各商埠的邮件也由汉口的这家法国邮局办理中转业务。

1901年该局开办不久，即收寄信件达2万余件，投递信件5000余件。同年10月开始办理邮政汇兑与包裹等业务。该局主要顾客为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应聘在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及部分商务侨民、外籍旅游者等，后来亦有中国人利用该局寄送至上海、广东、云南等地的信函、包裹等各种邮件。

四、汉口的德国“客邮”

1895年德国在汉口设立租界以后，直到1900年4月1日才在其驻汉口领事馆附近开办了1处邮政分局，其中文名称最初曾为“汉口大德书信馆”，地址在汉口城垣东北方的通济门外（现胜利街与一元路交叉路口）一带。该局使用在德国各版普通邮票和邮资明信片上另行加印德文“China”（中国）字样的在华专用邮票或邮资明信片，主图为德意志帝国鹰徽或德皇威廉二世头像；面值起初以原票上的德国马克为货币单位，后来又加盖了中国洋银面值。在该局开办之初，曾临时使用刻有德文大写“KANKAU”（汉口）字样及刻有中文“汉口大德书信馆”字样的两种长方框戳记盖销邮票，不久后即启用刻有德文大写“HANKAU DEUTSCHE POST”（汉口·德国邮政）字样的正式邮政日戳收寄邮件并盖销邮票。

汉口德国邮局不仅办理寄往德国和欧洲各国的平信、明信片、挂号信、包裹等邮件，而且还可办理通过其他各地的德国邮局寄往西亚土耳其、大洋洲澳大利亚等国的各种邮件的业务。该局邮资也分为两种：寄往德国国内及德国在华设有邮局各地（如上海、烟台、济南、天津）和被德国强行“租借”的胶州湾（青岛）等处，均按德国国内资费收取；寄往已加入万国邮联各国的，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资费收取。各种邮件大多交由德国来华商船或军舰返航时带回国内，后来也通过西伯利亚铁路经俄国陆路中转。在开办当年，该局即收信8万

件、邮包350个；寄信6.6万件、邮包500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17年3月，中国作为参战的协约国成员之一，正式向德国、奥匈帝国等国宣战，随即北洋政府交通部决定：于同年4月25日将德国设立的所有在华邮局、代办所、信箱等一律撤销。汉口德国邮局亦于此时被迫首先关门停业。

五、汉口的俄国“客邮”

沙皇俄国于1896年在汉口设立租界后，于1899年（一说为1900年，待考）在俄租界内列尔宾街的“巴公房子”公寓（Panoff Flats，亦名“巴公大楼”，位于现兰陵路中段）一楼开设邮局1处，主要办理寄往俄国邮件的业务，亦收寄寄往部分欧美国家的邮件，同时也兼办邮政储蓄等业务。该局原先使用加印有俄文“К К И Т А Й”（中国）字样的俄国普通邮票，主图为沙皇的双头鹰徽，面值以原票上的卢布为货币单位。该局收寄邮件时，如寄往俄国国内或俄国在华设有邮局各地（如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以及库伦等地），邮资按国内资费收取；如寄往已加入万国邮联各国，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资费收取。

汉口俄租界的沙俄邮局最初使用刻有俄文“ХАНЬКОУ”（汉口）地名的邮政日戳加盖在邮件上，后来又改用刻有法文“KANKOW POSTE RUSSE”（汉口·俄国邮局）等字样的邮政日戳。各种邮件起初大多由该国来华装运茶叶的货船带送，我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建成通车后，又改为通过中东铁路和俄国西伯利亚铁路陆运带回国内转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和保护下，继续控制中国境内各地俄租界的白俄分子不愿放弃他们的在华利益，又直接在多种俄国普通邮票上以英文加印中国银元币值，在各地俄租界的原沙俄邮局内发售贴用，并继续与被白俄分子占领的俄国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通邮。1919年7月，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原沙俄政府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享有的在华一切特权，中国政府亦于次年9月通知各地原沙俄邮局关门停业，但此举遭到了汉口、北京、张家口、烟台、上海等地的原沙俄邮局局长们

的“抗议”。经过有关地方当局的据理驳斥，各地的原沙俄邮局虽然于1921年2月后不再公开营业，但汉口的原沙俄邮局却仍然与白俄分子聚集的苏俄远东地区滨海一带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城市保持通邮关系，直到1922年秋远东地区的白俄分子被苏联红军彻底击溃后，汉口的原沙俄邮局才无可奈何地被迫撤销，原邮局所用房屋被中国邮局接管使用。

六、汉口的日本“客邮”

日本早在1871年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后不久，即于1876年下半年委托美国驻汉口代理领事兼美商旗昌洋行代理人爱德华·克能翰（Edward Cumingham，又译“克宁汉”或“金能亨”）为日本邮政驻汉口代理人，代办设于上海的日本邮局在汉口的邮政业务；后于1883年停办。1898年7月日本在汉口设立租界后不久，日本有关当局即因日、法间签订有邮件交换协定，于次年（1899年）9月11日首先在汉口法租界领事馆附近开办了一所日本邮局，收寄邮件。当年底其业务收入已达4700余元，平均每日收汇约1000元。

1906年，设在日租界中街日本人俱乐部对面的“大日本帝国郵便局”（一等邮局，其原址现为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35号，今滨江饭店对面）正式开业。邮局楼高两层，连同旁边的局长官邸及员工宿舍楼一起，占地面积广大，颇为气派。后来，该邮局还在日租界以外的俄租界马林街47号和法租界德托美领事街24号各设邮政分局1所；另在德租界胶州街、英租界太平路、华界的河街及歆生路各设信箱1处。

在此之前，在汉口的日本邮局还超越租界范围，分别于1903年4月1日和12月1日，在汉口以东约80公里的湖北大冶县石灰窑镇（今属黄石市）和与汉口一江之隔的湖北省会武昌城内，各自开设了1处邮政所。其中大冶日本邮政所设于聘有多名日本技师的汉冶萍铁厂日籍经理西泽公雄（Mr. K.Nishizawa）的公馆内，西泽公雄于1907年前后正式挂出“大冶日本郵便局”的招牌，对中国人开放营业，收寄至中外的邮件及汇款。而不对外挂牌的武昌日本邮政所，设于城内东大街（今大东门

附近)的日本人俱乐部一楼内,其负责人名叫今村直夫(Mr.Imamura);该邮政所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5时营业,办理200多名在武昌日侨的邮件收寄和投递业务。

汉口的日本邮局与其他各地的日本在华邮局一样,起初均使用日本国内普通邮票,主图为日本天皇家族的菊花纹章(即日本国徽)。1900年后开始使用专门加印有日文汉字“支那”(即“中国”)字样的各版普通邮票,以及诸如“庆祝(大正)皇太子大婚”等部分纪念邮票,以刻有英文“HANKOW·I.J.P.O.”(汉口·大日本帝国郵便局)等字样的邮政日戳盖销邮件;还使用过与日本国内邮局的图案相同、但地名或局名不同的数枚纪念邮戳,以纪念日本加入万国邮政联盟25周年、大正天皇登基大典、皇太子裕仁册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条约签订、明治神宫落成、日本国家邮政创办50周年等重大事件。在大治和武昌的日本邮政所使用的邮政日戳上,分别刻有英文“TA-YE·I.J.P.A.”(大治·大日本帝国郵便所)或“WOOCHANG·I.J.P.A.”(武昌·大日本帝国郵便所)字样。

汉口日本邮局(及其下属邮政所)在收寄邮件时,寄往日本国内和被日本侵占的朝鲜、我国台湾、大连以及日本在华设有邮局各地(如北京、上海、天津、苏州以及东三省等处),均按日本国内邮资收取;如寄往已加入万国邮联各国,则按万国邮联规定的国际邮资收取。所有寄往汉口与长江沿线各口岸及日本国内的邮件,均由日本在华开设的日清汽船运输株式会社的商船运送,经上海的日本邮局中转处理后,再寄往中国国内或日本及世界各地。该局从长江下游水路运往北京、上海等地的邮件均隔日一次,从长江上游水路运往宜昌、沙市、岳州(岳阳)、长沙等地的邮件每周三次发班。在汉口的各国“客邮”邮局中,后期显然以日本邮局的业务最为繁忙。

七、各国在汉“客邮”的全部撤销

1911年12月12日,汉口日本邮局设在武昌城内的邮政所,因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本国侨民撤离当地而自行关闭停业;设在汉口租界内的其他各国邮局及湖

北大冶的日本邮政所,则在此前后仍旧照常营业。

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远东及太平洋九国会议上,经过中国代表的多次提议,以我国国家邮政早经开办,成绩卓著,并已加入万国邮政联盟多年,且一切均照《万国邮政公约》办理为依据,最后通过了由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撤销在华“客邮”决议案》。根据该项决议,除了已经撤销的德国及俄国在华“客邮”外,其余英、法、日、美等国在中国内地设立的所有邮局、代办所、信箱等(东三省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客邮”和西藏的英属印度“客邮”等部分邮局除外),一律于1922年底撤销。因此汉口的英、法、日三国“客邮”的多处局所,亦于此时关闭停业。

汉口日本租界当局在商谈关闭本国所设邮局之时,作为补偿条件,曾要求中方在位置较为偏北、离汉口中心城区稍远的日本租界内专设一处邮政支局,其工作人员必须会日文、日语,以方便其本国侨民以及众多的临时来汉人员。湖北邮务管理局当时接受了这个要求,随即在日本租界内设立了汉口第七邮政支局,并专门委派一名懂日语的高级邮务员担任局长。但日本租界的总领事馆等机构,出于其政治及军事上的“保密”需要,此后仍然将其官方邮件全部交给来汉的日本轮船寄。

八、对各国在汉“客邮”的简短评价

综上所述,近代在中国各地林立的外国“客邮”邮局,作为老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对我国采取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曾在历史上从事过诸如侵犯我国邮政主权、收集我国情报、参与走私进口货物等非法行为,无疑起到了帮助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侵略我国的不良作用。如1903年4月17日汉口江汉关税务司曾致信上海江海关税务司,指出日本轮船由上海、南京运交汉口日本邮局的邮包中,经查验发现有大量未完税的走私物品寄出,并坚持今后汉口日本邮局的邮包运到本地由局长开袋接收时,必须有海关的主任验货员在场核查,以杜绝此种走私行为。

但从一分为二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国家邮政机构刚刚起步发展、尚未加入万国邮政联盟的初创阶

段，外国“客邮”邮局从客观上也对我国当时的邮政事业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或辅助作用。在此不可否认的是，实际上主要由外籍“洋员”所控制的中国邮政当局，曾与这些“客邮”邮局在业务上存在着相互合作的关系，并根据当时的中国政府与在华设有“客邮”的各国政府签订的一些双边邮政协定，通过与这些“客邮”邮局互换，转寄了大量从中国内地寄往国外尤其是欧美各地的各种邮件。

另外，在辛亥革命前后等中国近代历史上某些非常时期，当时的中国民众也曾利用外国“客邮”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我国享有特权、可不受我国官方检查或拦阻并自行组织外籍船只运送的有利条件，从这些“客邮”邮局收取或寄发各种邮件，以便于同外界保持通信联系。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汉三镇的中国邮局与国内各地的邮件交寄由于清军封锁并攻打武汉而全部被迫中断，无奈之下，汉口民众就通过各国在汉“客邮”邮局，辗转

寄出了一些中文信件，弥补了中国邮政机构此时因被迫关闭（或被焚毁）而不能正常运作的不足。

早期较为活跃的我国革命党人，也曾经通过这些“客邮”邮局交寄或收取过有一定保密内容的邮件，以利于进行革命活动。例如有资料显示，武昌起义后专程从上海赶来武汉参加革命指导工作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与设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陈英士等人的通信，在1911年10月底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均是通过汉口与上海两地的日本“客邮”邮局所传递的。其后，黎元洪统治湖北期间，为控制舆论、推行专制而经常派人到汉口邮局检查各报馆邮件。在此情形下，北京与汉口两地报馆之间有关评价、报道当时湖北局势的消息与通信，也纷纷改由设在汉口与北京两地的日本“客邮”邮局投递传递，因而避开了黎元洪方面的检查。这些也许是在汉开办这些“客邮”邮局的外国势力当时所未能想到或不愿看到的事实吧。

主要参考文献：

- 1.《武汉市志》（大事记、外事志、交通邮电志等分卷），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 2.《武汉邮政史料》（第一辑），武汉市邮政志编纂办公室编
- 3.《中国邮电史料》（第一、二辑），沈阳市邮政局邮政志办公室编
- 4.《中国邮票全集·附录卷》，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 5.《中国清代邮政图集》，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 6.《中国的邮驿与邮政》，人民出版社出版
- 7.《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 8.《中华邮政史》，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 9.《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江汉关）》，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 10.《水原明窗中国切手论文选集·旧中国卷》，财团法人日本邮趣协会出版

集邮与旅游相得益彰

● 林轩 黄玉魁

集邮，是对邮票、邮品进行收集、欣赏、研究和交流的文化活动，而集邮活动中的一切被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构成了集邮文化的内容。

旅游，是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旅行、观览和探究的文化活动。在旅游活动中的一切物质获得、精神愉悦和体力锻炼，构成了旅游文化的内容。

集邮和旅游都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人际交往和行为方式。集邮和旅游都是人们的一种交流活动，但一则以静、一则以动。集邮是在收集邮票的过程中，增加知识、陶冶情操，在方寸之间领略大千世界，足不出户可以观览千古盛事、世界风光，称为“坐游”。旅游则是在旅行游览过程中，身体力行，饱览湖光山色、民俗风情，获取直接的印象和观感，亦称“漫游”。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集邮和旅游的联系远不止于此。

集邮和旅游密切相关

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有200多个，其中独立的国家有近200个。国家不论大小，历史不论长短，都有各自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色。而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力求将自己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事件、经济成果、首脑名人、风光名胜、珍禽异兽、物产民俗表现在方寸之中，而这些也多是旅游者向往的目标。

邮票的表现力是无穷尽的，容纳量也是空前巨大的。就以名山大川来说，无论是横亘欧亚大陆的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系，还是纵贯南北美洲的科迪勒拉—安第斯山系，或是位于非洲大陆东部的东非裂谷，以及那些著名的山峰如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基博峰、汉科乌马峰等，都上过邮票。在世界各国邮票中，以尼罗河、刚果河、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

长江和黄河为图案的，也不计其数。除了这些山水湖景外，各国主要城镇风貌、著名的文物古迹、建筑物等人文景观也是邮票上的主要表现内容。

一个职业的旅行家穷尽毕生，也不可能走遍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更不用说能浏览所有的著名观光景点。其它人就更难历尽万水千山了。但是集邮则可以，集邮可以汇万千画面于一集，“坐游”胜于“漫游”。

但集邮者又不是只能“坐游”，二者的角色往往是融合为一体的。集邮者也能够、也需要成为旅游者，不仅要从小画面中去看世界，也要亲身去经历那真实的辽阔天地。旅游的历史比集邮可长多了，2500年前孔夫子就周游列国，历14年奔波而不馁；1300年前唐朝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也是足迹踏遍名山大川，而吟诵出无数佳篇杰作；400年前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毕生从事旅行和记录，留下一部地理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后代的旅行家、旅游者更是多不胜数。而集邮最长也只有160年的历史，远远没有旅游者的人数众多和影响力大。

但是，作为集邮者的旅游者又与一般旅游者不同：他们第一特别关注出了邮票的风光名胜，会在邮票的引导下，去了解邮票的发行背景，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各种书面和口头传诵的资料；第二会去寻找和考证邮票图案的原地，以寄发纪念封，盖纪念戳和风景戳；第三会把在旅游地制作的集邮品留存起来或者与邮友进行交流。集邮者在旅游时往往会找“三邮”——邮局、邮票、邮戳（或指邮局、邮戳、邮筒）。

由此诞生了邮局的三项业务，其一是提供风景戳，供爱好者加盖。仅我国从1986年以来，各地就刻制了1000多枚各式风景邮戳，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二是催生了门票明信片。现在各地邮局

与旅游景点联合制作门票明信片正显燎原之势，而“马踏飞燕”小型门票明信片也俨然成了一族邮品，甚至出现了“马踏飞燕”现象。此外各地邮政部门、邮票公司利用具有当地特色的邮票所开发制作的集邮品、旅游纪念品等礼品和收藏品就更加繁多了，成为邮政和集邮业务十分可观的经营增长点，这是其三。

而作为旅游者的集邮者，目前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集邮活动原是一项开放的活动，邮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易是其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人们思想禁锢的打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旅游和交往成为集邮活动中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重要的活动。随着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举办全国邮展及各地互展、联展和巡展，随着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的国际邮展、博览会和各地集邮联谊活动的蓬勃开展，到新世纪民间邮会的兴旺和民间邮展的红火，集邮者们自费赴展、参会、旅游已成规模。这次的“中国2003第16届亚洲国际邮票展览”就有50多个民间集邮组织齐聚绵阳，各地来参观邮展的会员就达数千人。而从1994年国人自费出国参观新加坡亚洲邮展起，组团前往他国参观邮展和旅游已成惯例。例如此次香港亚洲邮展期间，各国也都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参观旅游团，便是明证。

集邮者在亲身经历了旅游地的风尘、呼吸了旅游地的空气、感受了旅游地的别致之后，才能对邮票上所表现的画面有更直观、更丰富、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也就更能发挥邮票这个小型艺术品的特殊功效。

集邮促进旅游，旅游带动集邮，集邮与旅游将进一步结合

除了邮展和集邮学术活动，近年来邮票首发式蔚然成风。邮票和邮资票品首发式是邮政部门为新邮的发行而举行的专门活动。首发式举办地一般根据邮票题材涉及的原地或相关地确定。各地为提高知名度、加强经济交流，竞相争办邮票首发式。仅2002年国家邮政局就批准举办了38场首发式。这些首发活动都要邀请本地和外埠的集邮者参加，这无

疑也成了集邮者聚会的契机。2003年9月，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分别举办了“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邮票的首发式，各地均邀请国家邮政局、全国集邮联、邮票印制局、各地邮票公司、集邮协会等相关方面人士和集邮家出席，江苏宜兴还举行了“民间传说题材邮票研讨会”，邀集全国各地数十位论文作者和集邮家与会。可以说，每举办一次首发式或其它集邮活动，每到一地都是一次旅游，都要参观游览当地的著名景观，尤其是与邮票相关的纪念地。

集邮需要创新，集邮在不断创新。新世纪集邮迈向新领域，而现代集邮需要更多的集邮活动和集邮交流，也就是进行更多的集邮旅游。如果集邮者能够更多地走出家门，从“坐游”向“漫游”进发，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对集邮旅游模式感兴趣，使集邮者萌发新的集邮灵感，使集邮再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这就需要我们的集邮协会、集邮工作者、集邮媒体更多地宣传集邮旅游，组织好集邮旅游活动。集邮和旅游结合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大致可以分为：

1. 集邮专题旅游。如到航空博物馆、航天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及院校、研究机构进行的航空集邮旅游、航天集邮旅游、生物集邮旅游等。
2. 纪念活动旅游。如到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历史人物纪念地和故居、革命圣地进行的旅游。
3. 历史名城旅游。可与当地集邮组织进行联谊、联展、学习交流、参观游览等活动。
4. 集邮活动旅游。利用邮展、学术会、首发式的机会组团参与。有条件时，可以组织集邮者出国门，见识世界集邮风情和游览旅游胜地。
5. 集邮知识旅游。可以参观邮票厂、邮册厂、集邮家的邮集制作等。
6. 集邮休闲旅游。不必有严肃的题目，可以到近一些的旅游点漫步、喝茶；也可以到远一些的旅游点远足、探险，如长城游、雪域游等。
7. 集邮主题旅游。如关于2008年奥运会、“神舟”系列飞船等主题的讲座、参观。